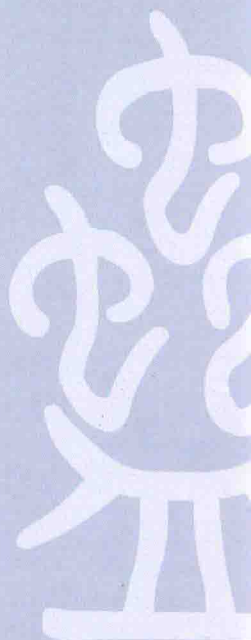


巫蛊之祸

西汉中期政坛秘辛

李峰 著





巫蛊之祸

西汉中期政坛秘辛

李峰 著

李峰 著

巫 蛊 之 祸 西 汉 中 期 政 坛 秘 辛

巫 蛊 之 祸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蛊之祸 西汉中期政坛秘辛》/李峰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 - 7 - 5649 - 1957 - 3

I. ①巫…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西汉时代
IV. ①K23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0466 号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韩琳
责任校对 霍晓玉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9 室

电话:0371 - 86059753(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24 千字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巫

目錄
序一

序一

羊年春节刚过,李峰博士就发来了他的新作《巫蛊之祸 西汉中期政坛秘辛》,约我作序。说实话,看到李峰发来的书稿,我多少是有点震惊的。他刚刚从河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半年时间,就有了新作问世,而且据说,这本书还是他与出版社签约的系列论著之一,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是另外的选题,他如何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又有众多创获?看来,他是在政治史的研究方面有所积累,有着周密的研究布局和重大的著述宏愿的。当今社会,视学术如生命,如此勤奋而痴迷的年轻人毕竟不多,我的确有责任也很乐意向学界推荐李峰博士和他的著作。

李峰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多次和我说过,他喜欢中国古代政治史,并希望探讨一种新的著述风格。其实,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经出版了《夭折的帝国:秦朝兴亡十六谈》(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一书,并且颇为畅销。这本《巫蛊之祸 西汉中期政坛秘辛》继承了《夭折的帝国》的著述风格。这是一种什么风格,我一时还不好给其定位。它既是一本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对巫蛊之祸这个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一次做了最为系统也最为全面的考察,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补充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有学术创新的价值;又是一本文字生动,叙事流畅,可以为社会大众阅读的书,具有通俗读物的某种特点。它既有史学论著的实证性、思辨性;又有通俗读物的故事性和细节描述,有对人物心理的合理推演,人物形象有栩栩如生之感。先不必去考虑著作属性的定位问题,因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判定,它是史学论著写法的一种探索。

史学著作应该如何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或者说需要当今史学界反省的问题。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学的研究性论著,变得与社会大众越来越隔膜,越来越让人不忍卒读!引文之大篇幅堆

砌,语言之枯燥无味,甚至是佶屈聱牙,既无飞扬之文采,也无思想之火花,不是乏味,就是平铺,完全激不起读者任何的阅读冲动。这样的文风不思改变,史学终将走入死胡同。因为,书总归是要给人看的。人们读不下去,光是作者自己在那里孤芳自赏有什么意义!

当代史学著述的枯燥乏味,在写法上我以为有忽视心理分析的原因。历史论著以事实为根据,而历史上的事件、事件中的人物,几乎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心理活动方面的材料,心理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逻辑推演,这似乎是不符合言必有据、论必有征的实证性原则的。但是,人要做事,就会有一系列具体的行为细节,而行为细节无不是出于特定之心理活动之支配,如果有人物活动的具体的细节性的材料做支撑,为什么不能从这些行为材料去推断其心理活动之轨迹,以揭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而把著述写得生动一些呢?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进行心理活动的推演性描述,未必不是可以尝试的。其实,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大都有丰富的人物性格、人物心理刻画,读《左传》,读《史记》时,我们都会很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也忍不住发问,作者不在场,没有与传主交流的可能,他怎么知道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还有那么多人物间的对话,又没有档案资料可查,他怎么知道历史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及其对话细节呢?然而,如果剥去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和具体言语的记录和描述,像《史记》的列传就不可能写得那样才情飞扬、言辞生动了。看来,历史写作是不应该拒绝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的。20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陆懋德先生在他的《史学方法大纲》中讲过类似的问题,观点也很明确。他说:“大抵吾人之观察某事,不过只能得其重要关节数点,其余皆是用自己的推理(reasoning)作用,以联贯之及补充之。不然,只是片段的事实,而不是完整的事实。举例如下:譬如《左传·宣公三年》记晋灵公使鉏麇刺赵宣子,晨往,宣子盛服早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乃触槐而死。吾人试思此刺客既未被捕,又当场自杀,可知当时无人窥见。既无人窥见,则此刺客之一段言论,更不能有人闻知。此因作书者以为刺客既未刺人,而反自杀,其中必有一番心理变化,故不妨用自己的推理作用,代为补充

数语,以完成此段史事。盖吾人所见所闻之事实,皆不能自始至终,完全得知,而大多数是用推理补充。此即所谓推理作用的补充,而无此则不能使记载圆满。此例在史书所在多有。如慎用之,尚无大碍,如滥用之,则流为失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翻印本,第55~56页)

陆懋德先生是肯定历史著述中应该有必要的推理演绎的。完全拒绝推理,许多记载都不能完整,无法连贯;而拒绝心理分析和细节描述,历史记载就无法生动、鲜活。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当今历史学界的注意呢?希望李峰是书在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对学界关于历史论著的写法问题有所启迪。

李峰博士对政治史有兴趣,想在揭示古代政坛的政治斗争方面展开系统性研究,并以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文风进行历史写作,从而把中国古代真实的政坛秘辛展示出来。我赞成这一研究方向和著述旨趣的选择。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属性就是其政治性,中国社会是个政治化极强的社会,政治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历史的足迹。从这方面入手,是可以窥见中国历史之特性的。况且,在传统社会,人们对政治和政坛的关注,从社会层面说,大都是关注一些宫闱秘事而把政治过于隐秘化和戏剧化,社会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念。如果从学者的角度,从宏大的历史进程背景出发去揭示古代政坛风云和政治斗争,对培育当代社会的历史观念,也是十分有益的。

李峰博士在本书的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学术理念,由是我才知道,他是有很好的理论修养的。李峰博士对于历史与文学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看法,属于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他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问题,也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这些都是他治学的思想前提和重要基础。没有一定高度或深度的理论修养,把握宏大的历史题材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难以洞穿历史之底蕴的。正是因为李峰博士有很好的理论修养,他对巫蛊之祸的悲剧性、必然性,巫蛊之祸的历史本质,以及巫蛊之祸对西汉历史的深层影响,都有很好的把握。他在序言中写到:

“巫蛊之祸给汉朝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惨痛的,但客观地说,这也是

其为实现社会变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代价未免太大,大到出乎武帝的预料。但汉家遭此劫难,只能坚强面对。换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汉家痛苦的涅槃,渴盼的是浴火之后的重生。因此无论是武帝掌权,还是霍光、宣帝主政,都力求冲破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将汉朝再次引向坦途。

“于是,经过二十余年持续不断的开拓,到了宣帝时期,汉朝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冲出历史的迷雾,迎来了渴盼已久的光明:长期旁落的皇权,重回君主之手。在宣帝的掌控下,汉朝政坛除旧布新,重新布局,一批优秀的官员被拔擢至统治机构中的要害部位,从而实现权力的再平衡;与此同时,经过持续的政策调整,皇权、豪族阶层、小农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得到缓和,社会局势日渐走向平稳;而在思想领域内,通过提倡《谷梁》学,使新的治国指导思想得以确立。汉朝由此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及至宣帝后期,终于实现了武帝四夷宾服、百姓和乐、天下太平的梦想。”

应该说,李峰博士对巫蛊之祸的把握是非常到位并具有宏大气象的。他将研究对象真正放置到了历史的整个进程中去观察,其认识之深刻,思维之辩证,都达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也可以说,李峰是书并不是单纯地解读巫蛊之祸,而是通过对巫蛊之祸的解读来透视从武帝到宣帝这半个世纪的整体历史进程。说实话,对于他的书稿我并没有时间通读,但通过他的序言,看到他有如此宏大的历史视野,有那么明确且志趣高远的著述理念,我就对他抱有充分的信任了。我相信,读者也不会失望的!

我期待着它的社会反响!

是为序。

李振宏

2015年3月26日

(本文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史学月刊》原主编)

巫

序一
序二

序二

读完李峰博士这部书稿,我脑海里涌现出两个问题:历史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被叙述出来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吗?

以往有一句话常常被人们当作历史叙述或研究的准则,那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历史”。这是一句需要认真琢磨的话。因为历史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早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汪洋大海里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并没有见过“历史的本来面目”,没有见过历史的本来面目,怎么能够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它呢?就像我们没有见过某个人,我们怎么可能按照他的模样来给他画一张酷似他本人的肖像呢?如果深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20世纪以来分析的历史哲学反复讨论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历史学家的核心问题。

从研究问题的一般操作程序来讲,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反映的都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即研究者运用各种手段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研究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研究者(历史学家)无法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的历史。因为客观的历史早已消失,历史学家生活在今天,但是他所研究的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时间把历史学家和他的研究对象分开了。历史学家所能面对的只是一些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即历史的蛛丝马迹。说穿了,历史学家只能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来叙述历史,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早已去世,人们只能根据他所遗留下来的零星的遗物来认识他一样。

流传至今的有关历史的蛛丝马迹——历史资料,往往是零散的、片段的,是历史的一堆“碎片”而非历史的完整面貌。完整的历史本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它本身已经不存在,如何复原和描述这个完整的历史就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碎片”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历史叙述的过程

就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遗留下来的碎片进行整理、选择、取舍、归纳和拼装的过程,这有点像警察根据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指纹、鞋印等犯罪证据恢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经过一番编排制作以后,历史就被叙述和描述出来了。

接着问题就又来了,这样叙述出来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吗?对此人们可能会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实际上,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关乎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基础问题。史学是一门追求真实的学问,人们似乎天生就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真实的愿望,例如人们常常这样说,“这是历史事实”,“它们符合历史实际”,“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此等等。但是,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真实,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至少有事实的真实、观念的真实和叙述的真实三种情况。

事实的真实是19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意识,当时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历史,历史就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它,它都客观存在着。只要弄清历史事实,就弄清了历史的真实。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历史学家只需要秉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全面占有历史资料,对资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分析,弄清一个个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这种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受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所谓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观念的真实,历史事实之所以是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选择的结果,历史学家根据某种需要选择了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就变成了历史事实;而那些没有被选择到的东西,就不是历史事实,甚至就不存在。历史是否真实,不是事实决定的,而是观念决定的,观念决定历史真实,历史不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历史学家建构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叙述的历史哲学又往前跨越了一步,认为用什么样的语言程式叙述历史,历史就呈现为什么样式,语言的使用方式对历史叙述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的真实取决于叙述的真实,历史是由叙述建构的。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的建构取决于历

史学家对故事情节的编排,编排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

细绎这三种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观念,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只是后者总是否定前者,导致自己走向极端从而变成谬误。实际上,只要我们把这三种观念打通,就会发现它涉及历史认识客体(客观历史)、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历史表述)这三个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正是这三者决定了历史叙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历史的真实。

前面谈过,历史学家只能根据客观历史的遗留物——历史资料来复原历史,这些历史资料可能是零散、片断、互不联系的,甚至可能会有舛误和伪造,但是,经过历史学家的辨伪存真,这些资料中也一定包含了不少真实的历史信息。譬如这部书中提到的汉武帝、江充、霍光等人物,一定是汉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不是虚构的,因为这是由历史资料证明了的。他们曾经活跃在汉朝的历史舞台上,做过很多事情,这就是事实的真实,自然也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是不容否定的历史真实。因此所谓历史完全是历史学家建构的这一说法必然不能令人信服。

事情总有多面性,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那就又错了,为什么呢?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座年代久远的房子,这座房子经过几千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实际上早已委顿颓败,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些许断砖、残瓦和朽木,这些断砖残瓦朽木固然是这座房子的真实构件,但历史学家要复原这座房子,必须考虑这座房子的构架,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而这座房子本身已不存在,也没有图样可供参考,历史学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所见所闻重构这座房子。他们固然用了那些砖瓦朽木等房子的真实构件,但他所构筑的这座房子是否就是原来房子的模样,就大成问题了。而且这些残留的砖瓦远远不够用,很多空间可能还是用现代砖瓦填充上去的。所以,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决定了这座房子的模样,在这里,历史的真实构件和现代的虚假臆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房子。

叙述历史必然要使用语言、词语和文本。换言之,历史学家要靠

语言把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描述出来,与语言相关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必然会限制人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表达。还用前面这个例子说明问题,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构了那座房子,但他想向人们展示什么,是房子亮丽的色彩还是灰暗的色调,取决于他怎样拼砌那些真实的和想象的砖瓦。不同的拼砌方式会展示房子不同的侧面。也就是说,叙述的历史是被组织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被历史学家编排过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借助历史的叙述来向人们传递某种历史意义。

分析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之后叙述出来的,这种叙述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其中既有历史事实的真实,也有历史学家主观的取舍,更有处理文本时的编排。这样的叙述既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积极表达,也受到认识客体客观性的制约。

读完李峰博士的这部书,您是否也作如是观?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都喜欢读史,并往往会被那些历史故事所吸引。实际上,历史并不本然地呈现为故事。更确切一点讲,历史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像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完整。它包含了太多的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有太多的意外和未经展开就夭折了的线索。客观的历史往往表现为散乱发展的特性,大多数人的活动互不相干。历史虽然在大量的互不相干的偶然因素当中包含着一个可被提炼与叙述的故事性内容,但并非不经叙述就能成为故事。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历史故事都是在事后回顾的意义上呈现的,历史叙事文本前后连贯、首尾呼应的模式是历史学家赋予的,与历史本身的样子相差很大。

李峰博士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一个带点神秘色彩的故事。他沉潜于历史的细节,在一堆一团乱麻般的历史资料中剔抉爬梳,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态。书中虽有线索,但没有宏大叙事,我们看到的都是历史的细节。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没有血肉的历史,更是没有趣味的历史。注重细节不沉溺于细节,在细微处发现大问题,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至于本书所讲的内容怎样,作者是否描写出了真实的历史,里面又有

多少他自己的价值观念,那就等读者诸君看完这部书后再作评论吧。

最后我想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两句话以作结束。

第一句话,罗素说:“我认为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有趣味的历史来的。”我不是说李峰博士的这部书存有“偏见”,我是想说,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谦虚地承认自己的偏见,同时也谦虚地容忍别人的偏见。

第二句话,罗素说:“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会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如果要让读者有兴趣,就必须允许他在戏剧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么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所有著作的作者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所“偏袒”。如果难以忍受,那就看看与之持论相反的著作吧,这样可以提高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王记录

2015年8月21日

(本文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

巫

序二
序三

序三

十多年前,本人还未从事史学研究时,曾创作过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本人在日后的史学研究中,总会不自觉地将两种撰述活动进行比较,并常常因此而惊讶不已。

本人发现从事史学撰述活动与小说创作过程非常相似。比如都是选一个题目,然后把与主题相关的素材拿过来进行编排,所不同的是写小说是要将素材加以升华、虚构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文学创作还是对史学撰述而言,题目或者说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什么样的主题,才有什么样的素材汇聚其下,文学自不必说了,即以史学而论,班固对《汉书》的撰述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班固撰《汉书》的主旨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①,因此《汉书》所叙述的基本上就是与此有关的内容,与此无关者,一概排除,这种现象被称为选择性客观。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无论他们选取的素材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他们所要表达的都是一种主观情怀。

故当今学者每每喜欢表彰《史记》《汉书》等史著的实录精神,然后推演出史家之伟大,实属过誉。实则古代史家并不以此为荣,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撰述活动是否实现了自己的初衷。所以当今如果一定要表彰某位史家的实录精神,也不宜过于推崇,因为史家之优秀并不是通过他的实录精神来体现的,正如英国史家 E. H. 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言,利用真实的史实撰述历史不过是史家的一项基本功而已,而属于基本功层面的东西是不值得炫耀的:“赞扬历史学家叙述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

^①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一百下《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5~6309页。

运用混凝土一样。这是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①史家之优秀主要是体现在他是否能够用这些史实充分表达出他的主观意念。二十四史中“前四史”之所以获得盛名,个人感觉就是与其特色鲜明、或者说主观意愿表现突出有关。而事实上,以西方后现代史学理论关照史学,即便这种选择性客观也是不存在的,在后现代史家看来,历史的叙述与文学创作已无甚区别。若真如此,则主观性竟成了史家赖以立身的根本。

虽然如此,本人仍觉得史学与文学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历史素材无一不是来自人类实实在在的经验,从人类的真实经验出发,来剖析历史的变迁、人世的悲欢,所产生的震撼是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当然这种剖析与所谓的“规律”无甚关联。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撰述不过是利用人类的经验来表达一种主观的思想而已。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撰述历史就是一种创作,抑或可称作是创造,就像建筑师用钢筋混凝土去构造那只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如北京的鸟巢、水立方。由于存着这样一种想法,故本人在从事史学撰述活动时,虽然自知无甚天才构想,但是很享受这种创作过程。本书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

本书之所以以巫蛊之祸为选题,是因为该事件既是汉代政治长期演进的结果,又是新的时代的起点,在汉代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意义,对西汉历史影响甚巨,有着极强的研究价值。

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在汉朝政坛的巫蛊之祸,是汉代矛盾斗争持续深化的结果。

汉武帝继位后,面对问题丛生的统治现状,主动出击,强势应对,一路行来,颇有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气概。然而让武帝遗憾的是,他虽然穷毕生之力与匈奴争雄,但想要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征服匈奴的愿望,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武帝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可是卫太子刘据却主张偃武修文,推行仁政;同时,卫太子为储君数十年,不仅深得民心,且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与武帝已成分庭

^①(英)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2页。